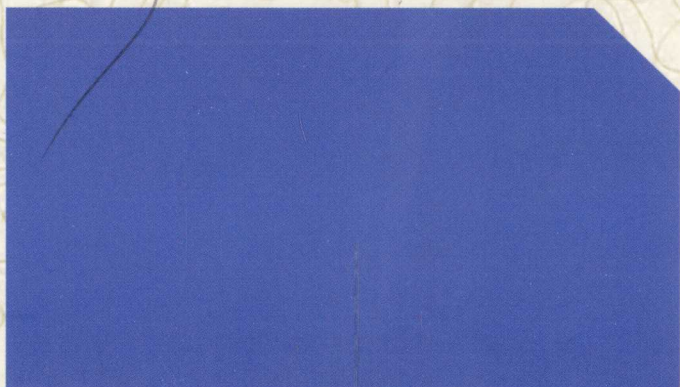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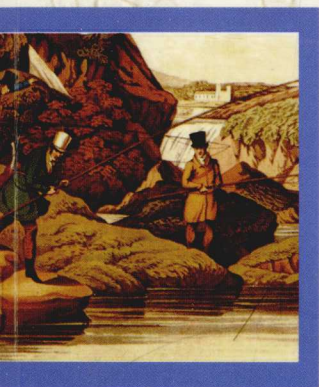


I206.7

312

中外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丛书
武汉大学十五“211工程”项目



叶立文◎著

“误读”的方法

新时期初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
传播与接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外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丛书
武汉大学十五“211工程”项目

“误读”的方法

新时期初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
传播与接受

叶立文◎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误读”的方法：新时期初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传播与接受/叶立文主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8
(中外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004 - 7963 - 5

I. 误… II. 叶… III. 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6145 号

责任编辑 李炳青

责任校对 郭 娟

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0.375

字 数 248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引 论	(1)
一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传播的社会背景	(5)
二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传播的思想背景	(10)
三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传播与接受的历史进程	(21)

上编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传播策略

第一章 唯物辩证法: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传播的认识论 ...	(27)
第二章 政治误读: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政治正确”	(45)
第三章 思想误读: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马克思主义化 ...	(76)
第四章 美学误读: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现实主义化	(137)
第五章 历史误读: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与中国五四新文学 ...	(170)
结 语	(204)

下编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接受历史

第六章 “对话”与“潜对话”:“现代派”论争引论	(209)
第七章 政治对话: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传播中的 政治接受	(216)

“误读”的方法:新时期初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传播与接受

第八章 文学对话: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传播中的文学接受	(229)
第九章 “三个崛起”与“三只小风筝”: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接受的理论个案	(248)
第十章 从“意识流”小说到“拟现代派”小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接受的创作个案	(279)
结 语	(320)

(1)	第一章
(2)	第二章
(3)	第三章
(4)	第四章
(5)	第五章
(6)	第六章
(7)	第七章
(8)	第八章
(9)	第九章
(10)	第十章
(11)	第十一章
(12)	第十二章
(13)	第十三章
(14)	第十四章
(15)	第十五章
(16)	第十六章
(17)	第十七章
(18)	第十八章
(19)	第十九章
(20)	第二十章
(21)	第二十一章
(22)	第二十二章
(23)	第二十三章
(24)	第二十四章
(25)	第二十五章
(26)	第二十六章
(27)	第二十七章
(28)	第二十八章
(29)	第二十九章
(30)	第三十章
(31)	第三十一章
(32)	第三十二章
(33)	第三十三章
(34)	第三十四章
(35)	第三十五章
(36)	第三十六章
(37)	第三十七章
(38)	第三十八章
(39)	第三十九章
(40)	第四十章
(41)	第四十一章
(42)	第四十二章
(43)	第四十三章
(44)	第四十四章
(45)	第四十五章
(46)	第四十六章
(47)	第四十七章
(48)	第四十八章
(49)	第四十九章
(50)	第五十章
(51)	第五十一章
(52)	第五十二章
(53)	第五十三章
(54)	第五十四章
(55)	第五十五章
(56)	第五十六章
(57)	第五十七章
(58)	第五十八章
(59)	第五十九章
(60)	第六十章
(61)	第六十一章
(62)	第六十二章
(63)	第六十三章
(64)	第六十四章
(65)	第六十五章
(66)	第六十六章
(67)	第六十七章
(68)	第六十八章
(69)	第六十九章
(70)	第七十章
(71)	第七十一章
(72)	第七十二章
(73)	第七十三章
(74)	第七十四章
(75)	第七十五章
(76)	第七十六章
(77)	第七十七章
(78)	第七十八章
(79)	第七十九章
(80)	第八十章
(81)	第八十一章
(82)	第八十二章
(83)	第八十三章
(84)	第八十四章
(85)	第八十五章
(86)	第八十六章
(87)	第八十七章
(88)	第八十八章
(89)	第八十九章
(90)	第九十章
(91)	第九十一章
(92)	第九十二章
(93)	第九十三章
(94)	第九十四章
(95)	第九十五章
(96)	第九十六章
(97)	第九十七章
(98)	第九十八章
(99)	第九十九章
(100)	第一百章

引 论

作为一种“知识”，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在中国大陆的传播可谓由来已久。自五四时期便已开始的这股传播浪潮，虽然曾因政治形势的剧变一度归于沉寂，但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末大陆思想界的解冻，西方现代主义的传播又展开了新一轮的运作。这场传播运动的过程与结果，不仅揭橥了新时期初各类权力话语的力量纷争，亦令现代主义思潮在反对与争议声中不断发展壮大，余波所及，终致其曾经式微的影响力从此无远弗届。要而言之，发生于新时期初的这场现代主义传播运动，在经历过种种迂回曲折的权力斗争后，最终促成了现代主义知识的合法化。20 世纪 80 年代的知识界（自然也包括文学界）对于西方现代主义的异常关注，使得现代主义成为了知识分子以各种方式谈论“中国问题”时无法回避的一个理论基础：在反思“文化大革命”、呼唤人性回归与正义重建的思想解放运动中，西方现代主义被中国知识分子们赋予了一种针对“文化大革命”异化现象的批判功能，它也因此在当时成为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启蒙武器；而与反思历史同步展开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则同样在西方现代主义知识的传播过程中，不断汲取着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理论资源。在中共中央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号召下，中国知识界的哲

学、文学、历史、经济、法律等各个学科领域，都与西方现代主义知识发生着一系列意义深远的碰撞与融合。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与经济基础的现代化建设同步展开的精神文明建设，实际上彰显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现代化转型。尽管在新时期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现代化转型与西方现代主义之间仍然存在深刻对立，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所显现出来的某些现代化特征，却与西方现代主义知识的传播和接受密切相关。换句话说，从西方现代主义中汲取某些中国社会所需的知识资源，使其为思想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业已成为新时期初西方现代主义知识在中国传播的一个普遍规律。

本书以新时期初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大陆的传播与接受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介绍和阐释等传播活动，试图还原与厘清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新时期初的一段传播与接受历史。在此基础上，本书拟就中国知识分子在传播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时所运用的基本方法、策略与手段等问题展开讨论，以期澄清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大陆的知识合法化进程。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的研究重心并不在于讨论现代主义文学“是什么”的问题，而是关注中国知识分子是如何阐释与介绍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换言之，作为传播客体的现代主义文学，唯有经过中国知识分子这一传播主体的译介与阐释，才会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实际而有效的影响，也才能突破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力规避，进而在种种话语纷争的历史格局中完成自身的知识合法化。这意味着，理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传播历史，远比理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是什么”更为重要，毕竟对于大部分中国作家而言，他们所接受的现代主义文学，实际上是经由中国学者阐释了的“现代主义”。这一被阐释了的文学资源业已

成为中国当代作家进行现代主义试验的一个文学传统：其中不仅包含了中国知识分子思考“中国问题”时的启蒙情结，亦承载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化诉求。前者造就了中国当代的现代主义文学，如先锋小说的启蒙叙事和存在关怀，后者则暗含着中国当代文学界走出西方中心主义、追求文学现代化的良苦用心。有鉴于此，若可澄清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大陆的知识合法化进程，就能在异域知识的文化旅行中去领悟现代主义文学的本土化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对中国知识分子传播与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就不仅仅是对一种异域文化在传播过程中所进行的知识考古，也是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现代主义化倾向所展开的理论寻根。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受到新时期初社会语境和思想氛围的严重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在介绍与评价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时容易出现为后人所诟病的“误读”现象。大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因有感于既往学界对西方现代主义的理论“误读”，进而主张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展开“正本清源”式的学术研究。然而这一讲求严谨学理的研究方式，却在辨析现代主义文学“是什么”的同时，无意间忽略了此前隐含于中国知识分子“误读”行为中的思想启蒙因素，以及他们对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诉求等复杂问题。这就是说，当我们执持于西方语境中的现代主义、试图纠正中国知识分子的误读行为时，反而有可能遮蔽现代主义本土化所隐含的重要思想价值。就此而言，今人如能秉承一种历史主义的认知态度，当有望在回顾这段传播历史时，充分理解中国知识分子念兹在兹的实用理性精神如何影响了一种异域知识的文化旅行。

回顾新时期初，在思想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

史进程中，西方现代主义知识的传播与接受可谓命途多舛：自传播之日起，西方现代主义知识就不断承受着来自社会各方的责难，其主要罪状即为传播行为本身有可能造成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力的损害。究其原因，这一问题实与当代中国社会的某种意识形态偏见有关。在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现代主义知识因其“西方”背景，而被视为一种“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至于现代主义文学对世界荒诞本质的形象描绘，对人性异化现象的深度考察，等等，都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偏见下被视为对社会主义权力根基的动摇。因此，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在新时期初中国大陆的传播与接受，就具有了一种极为吊诡的命运：一方面，为促进思想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那些致力于传播现代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往往不遗余力地翻译和推广着西方现代主义知识；但另一方面，为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威，中国知识分子又在传播现代主义的过程中，不断地对其加以批判和反驳。这种自相矛盾的传播方式，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形成了蔚为奇特的现代主义传播与接受景观。由此造成的一个事实是，在传播西方现代主义知识的历史实践中，中国知识分子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力规范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客观需求出发，本着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在批判和反思现代主义知识的同时，充分发掘了现代主义知识的合法性因素。具体到文学领域，这一合法性因素便是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主义现代性问题的关注，以及对现代主义启蒙功能的充分发掘。在新时期初的中国学者看来，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不仅有助于中国文学界认识“文化大革命”和反思“文化大革命”，体现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进程，而且还能够促进当代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因此，中国学者如何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这一被视为“腐朽没落”的资产阶

级意识形态中，发掘有利于思想解放运动和当代文学现代性追求的合法性因素，便成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传播者们首先考虑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在新时期初的传播实践中，又最终演化成了多种策略性的传播方式。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传播策略的影响下，中国文学界对于现代主义的接受也并非一帆风顺，它往往在兼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权威的过程中，通过对现代主义的文学接受，逐步推动着当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追求。本书致力于探讨的一个重点问题，即有关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传播策略与文学接受。但在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传播策略进行具体考察之前，首先需要阐明的是这样一些问题：即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隐而未彰的合法化过程中，谁为现代主义的传播颁发了许可证？又是谁为现代主义的合法化制订了叙述法则？对于上述问题的考察，实际上已经涉及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传播的社会背景和具体过程。

一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传播的社会背景

1976年年底，“文化大革命”结束。1977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宣布“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而结束。这次会议的文件，把“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称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无论从哪方面看，人们对于“新时期”历史的理解和阐释都与“文化大革命”这一标志性事件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已成为1976年以后历史叙事的逻辑起点。当人们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梦魇中惊醒时，很容易将“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历史视作与新时期截然对立的蒙昧时代。于

是，“新时期”这一描述后“文化大革命”历史的政治术语便被赋予了显而易见的价值色彩，它所指代的历史时期也在“新/旧”对立的二元关系中占据了先天的价值优势。而国人告别“文化大革命”、期盼历史新时期的社会心理，则使“新时期”这一提法不再局限于狭义的政治领域，转而在超意识形态的意义上被频繁使用，成为可以指代一切后“文化大革命”历史的能指符号。因此，任何一种对于后“文化大革命”历史事件的研究，都无法偏离“新时期”这一特定的社会语境。由“新时期”这一称谓背后所蕴涵的社会集体性意愿出发，人们普遍要求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发生变化。“左”倾激进的、建立现代乌托邦的革命狂热，逐步为“现实主义”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所取代。^① 国家领导层对“文化大革命”做出了明确的否定，宣称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②。

有中国学者在描述这一社会变革时说：“打倒‘四人帮’后，中国进入了一个苏醒的新时期：农业小生产基础和立于其上的种种观念体系、上层建筑终将消逝，四个现代化必将实现。人民民主的旗帜要在千年封建古国的上空中真正飘扬。”^③ 这一观点表达了当时中国民众的普遍意愿。由“十一大”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出发，中国社会很快掀起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这一运动几乎波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其最初表现主要是对当

① 参见洪济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②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1981年6月）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载《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11页。

③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447页。

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路线和政策的检讨。围绕这一问题，20世纪70年代末在国家最高权力阶层内部，曾有过争论和冲突。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展开了全国性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支持“思想解放”的命题，批评了维护僵化教条的“两个凡是”，^①并决定撤销在1976年做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文件，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会议确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提出中共全党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而文学界在这一思想解放的潮流中，首先做的也是被称为“拨乱反正”的工作。^②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文学界开始深入揭批“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1977年11月，《人民日报》编辑部邀请了许多文艺界人士进行座谈。会上，茅盾、冰心、刘白羽等人都表示唯有批判和推翻“文艺黑线专政”论，才能真正解放文学艺术的生产力，从而推动社会主义新文艺的繁荣和发展。1977年12月28日，《人民文学》编辑部邀请文学界人士一百多人，召开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座谈会。会后，《红旗》杂志发表文章清算“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1978年5月27日至6月5日，中国文联在北京召开了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不仅批判了林彪和江青集团在文艺领域内的极“左”路线，

^① 当时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提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参见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

^② 参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而且还着重研究和贯彻落实了党的文艺政策。会议宣布中国文联、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和中国舞蹈工作者协会正式恢复工作，文联的机关报《文艺报》也随之复刊。1979年2月，《文艺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文艺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提出“文艺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的号召。从这一口号的提出开始，身处历史转折期的中国文学界，便将发展文学艺术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紧密结合起来，由此也开启了嗣后持之以恒的文学现代化诉求。

1979年5月3日，中共中央同意撤销《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标志着中国文学界的“拨乱反正”工作在政治领域取得了胜利。与此同时，文学界也对“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这一影响十七年文学基本面貌的“左”倾观点进行了深入反思与严厉批判。1979年，《上海文学》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全面回顾了“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个口号形成和流传的过程，并对其造成的严重后果予以了清算。文章指出：“我们的文艺要真正打碎‘四人帮’的精神枷锁，‘解’而得‘放’，迅速改变现状，满足群众的需求，就必须对‘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个口号进行拨乱反正的工作。”文章认为：“‘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之所以必须纠正，因为它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说成是唯一的、全部的关系，这样的文艺观，将导致文艺与政治等同，因而是一种取消文艺的文艺观，必须从理论上加以澄清。”^①同时，该刊还开辟了“关于《为文艺正名》的

^① 本刊评论员：《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上海文学》1979年第4期。

讨论”专栏，各地报刊也就此问题展开讨论。这一事件充分说明了新时期的文学界力求改变既往文学观念和创作格局的决心。而在稍后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中国文学界对于“文艺民主”的要求则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支持。

1979年10月30日，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致祝词。在祝词中，邓小平明确阐述了新时期文艺的任务和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的问题。他指出，文艺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能横加干涉。在赋予文学界文艺民主的同时，邓小平也谈到了文艺自由的问题，主张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要求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拓宽文艺创作的道路，丰富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防止和克服单调刻板、机械划一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等等。^①随后，邓小平又在讲话中进一步强调，我们“不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依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②邓小平的讲话，明确做出了围绕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丰富文艺创作方法的指

① 参见《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载《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② 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载《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0页。

示，而这一讲话对文艺创作方法多元化的政治肯定，同样有助于改变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文坛一统天下的局面，也在一定程度上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传播从政治领域打开了通道。

总体而言，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文学界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运动，所取得的成绩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批判“四人帮”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开始，清算了“四人帮”的文艺体系和理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艺思想的解放；二是通过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思考，重新认识了现实主义理论及文学中的人性与人道主义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现实主义和文学中的人性与人道主义等重要命题，均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辨析与讨论，其结果不仅突破了许多理论禁区，而且也为后来现代主义文学的传播打开了政治通道；三是结合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实践，通过认识与评价“伤痕文学”，讨论“歌颂与暴露”、“‘歌德’与‘缺德’”和文艺“向前看”或“向后看”等具有争议性的话题，从微观层面深入思考了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这对于促进文艺思想的进一步解放，显然起到了正本清源的积极作用。而上述工作，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中国当代文学从“文化大革命”文艺到新时期文艺的巨大转变，其间文学思想的日新月异，则为日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传播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传播的思想背景

如果说新时期初政治形势的变化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传播

打开了政治通道，那么，在社会思想领域内各类话语的历史合力，则进一步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传播赋予了理论依据。本章首先需要考察的就是新时期初社会思想领域内的话语构成，它同时也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传播的思想背景。“话语”（discourse）作为构成社会语境的基本叙事元素，它所拥有的叙事功能便是将复杂的政治变动、经济改革和社会思潮分解为性质各异却相互勾连的“言说方式”，这种种“言说方式”的多元存在集中体现了社会语境的成型与变异。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社会语境中，有两种话语类型足以支撑起全社会的思想言路，这就是意识形态话语和启蒙主义话语。当然，如此“简明”的类型划分难免失之粗疏。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因为这两种话语类型的存在，“新时期”中许多复杂的社会事件才能被加以适当地阐释与理解。而且，意识形态与启蒙主义这两种性质迥异的话语类型因其在历史目标上的一致性，进而拥有某种异质同构的关系。这一话语同构的组合方式，实际上为新时期初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传播赋予了广泛而坚实的合法性依据。

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以后，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也随之发生了极其显著的变化。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理性认知的集体迷误，社会正义与人性价值遭到了彻底崩毁，社会生活赖以正常运转的法律秩序与道德伦理荡然无存，封建蒙昧主义假借“革命”之名公然肆虐，私欲与暴力替代了现代乌托邦的理想主义，人民蒙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深重的灾难。在此社会背景下，社会公正的重建与人性价值的复归便成为人民渴望从噩梦中醒来的先决条件。一场呼唤“民主”、“科学”、“人性”的启蒙主义运动悄然勃兴。在这场思想启蒙运动中，西方现代主义思潮扮演了催化剂的角色。不过，首先为西方

现代主义思潮的传播确立合法性地位的，不是赓续五四精神的启蒙主义传统，而是意识形态话语的自我调整。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展开了全国性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最终推翻了“两个凡是”的命题，确立了“实践”精神在国家建设中的元话语地位，将以往“左”倾激进的乌托邦梦想逐步纳入了讲求效率的“现实主义”轨道。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时，这次会议还确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提出中共全党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①从此，意识形态话语便将自身言路的核心从“阶级斗争”转向了“现代化”诉求。在这一转向中，“意识形态”本身所拥有的话语功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术语，“意识形态”（ideology）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之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在考察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发生变革的时候，必须把下面两者区分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和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②可见，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是指法律、政治、宗教、

①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1981年6月）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载《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11页。

②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页。